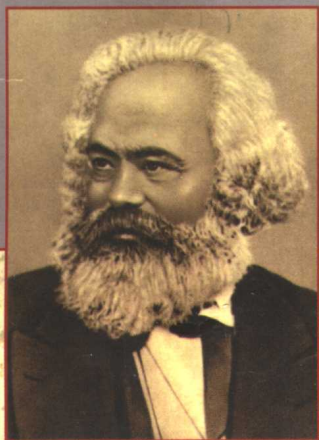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书系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高齐云 著



#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生形态探微

高齐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

高齐云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厂址:惠州市南坛西路17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2插页 460,000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8-03060-2/A·6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084 83790667

---

## 总 序

献给读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专著系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成果，是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当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时，邓小平以无畏的政治胆略与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阐发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这个根本上拨乱反正的促进下，全面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由此，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工作者，同样开始冲破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的束缚，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历史，逐步认清、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的真实本质与面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研究的热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北京出版社1989~1996年陆续出版）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问世，由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解放思想、重新研究的丰富成果。

学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历史，恢复、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本质和科学精神，是一个逐步深化、不断前进的过

程。一方面，由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侵袭、扭曲，其影响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层面，只有经过反复认识、深入思考，才能进行较为彻底的清除；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形成多样化形态，同样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展开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发展中的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基于这种认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一些同志在1988年7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观点；在1989年7月，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多样化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内涵还表述了这样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立场和视角，去研究、总结社会实践和为社会实践服务，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而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具体任务、研究的基本课题、确定的理论内容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从纵向顺序来看，先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或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原生形态的主体，接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为直接的理论来源的次生形态，然后有以某个次生形态为主要的理论来源的再次生形态，等等；从横向排列来看，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个体的条件的不同，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又包含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及其体系。坚持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样化的关键。

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即将从 20 世纪跨进 21 世纪，历史的发展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首先，信息时代的开始，使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强。其次，冷战的结束，更突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主题。再次，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出现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社会主义模式。为此，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广泛、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样化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对根本清除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左”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扭曲、影响，对彻底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封闭与僵化状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新时代新实践的要求而不断丰富、发展，对揭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的演变历史，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组织本专著系列的研究、撰写的。

本专著系列精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不同形态中具有典型性的哲学代表，专门进行研究、论述。各部专著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但每部专著都围绕着哲学和自己时代的关系去展开，论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sup>①</sup>，它们“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sup>②</sup>。阐明这样一种规律性：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历史课题的哲学体系，每个国家都会形成指引本国人民前进的理论旗帜。本专著系列在学术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专著的作者在着重阐述自己选定的理论家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对其属于何种形态，采用何种具体形式，构建何种哲学体系等等，都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出具有特色的、新颖的论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解放思想没有止境，我们的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又很有限，因此本专著系列不一定能完全体现上述思想，甚至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还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期待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教，争取共同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主 编

1997 年 7 月

---

## 自序

献给读者的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是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哲学原理、哲学经典著作以及哲学发展史等）课程的教学，并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发现新问题和不断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显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独特的科学的认识。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教师，最初并不是我的自主抉择，而是一系列外部事件所影响造成的。从少年开始，我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喜爱。我的故乡江西吉安，古称吉州、庐陵，历史上名士辈出。我幼年时，就从长辈那里听到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事和诗词。先母李凤娥出身江西吉水一个大家庭，她常带我去探望娘家的亲人。当我读小学时，就在那里看到陈岳修撰的《唐书》、欧阳修撰的《新唐书》和他的《欧阳文忠集》、杨万里的《诚斋集》、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并且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故乡先贤的风范和他们优秀的诗文，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先父高华生是位商店店员，远在外地工作。但他关心子女的成长，回乡探亲时往往带来一些新书，其中就有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这些现代中国文豪的名著，也培育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学校校址吉安白鹭洲，是124年由南宋名士江万里创办的“白鹭洲书院”旧地。这独特的氛围，更燃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一有机会，我就沉浸在图书馆的诗集史书中。可我在此仅读完初中一年级，便随父母迁居湖南衡阳。但是，住地的变化以及1949年的解放，并没有改变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虽然

新中国成立后我就购买了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和《论列宁主义基础》来阅读，但这种革命的追求并没有排挤我心灵中的爱好。高中学习时期，我的班主任马积高老师和语文课主讲吴容甫老师，除了鼓励我政治上进步，还引导我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理性了解。从湖南衡阳市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我如愿考入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在1951年秋至1955年夏的本科学习期间，先后得到詹安泰、王起、黄海章、楼榭、容庚、高华年、冼玉清、董每戡教授等的亲切教导，帮助我汲取了关于中国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了在这方面进行独立研究的技能与方法。对中国汉语言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宝库的浩瀚、丰富、瑰丽、多彩的领略，更加深了我对它的喜爱。在詹安泰、王起教授的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论李白的诗》获得优异成绩。其中的一部分——《论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并被选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该集从“五四”时期起至1962年6月公开发表的上百篇研究李白的学术论文中辑选33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已建立在对它理解的基础上。本科毕业时，王起教授免试录取我攻读他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这一切，为我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大门。

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出现了我意料不到的事件，开始影响我学习发展的轨迹。当时，中山大学正筹备复办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的哲学系，计划选派合适人员赴苏联留学，学习美学，以便日后回校任教。有关领导找我多次谈话，希望我接受这个任务。我听后感想十分困扰，感到难以抉择。一方面，我爱好中国文学，在学习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只要在导师指导下刻苦钻研，必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赴苏留学是当时大学青年热切向往与追求的，我自然也是这样；同时我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在学术上有大的提高，必须系统学习、深入

掌握美学理论，留苏学习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我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坚持研究中国文学，就失去争取留苏的机会；要把握争取留苏的机会，就得放弃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和征询师友、亲人的意见，我设想留苏学习美学后，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将重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即把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同意提前毕业，于1956年7月告别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但是，意料不到的事件接踵而来，使我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更大的转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很快变为反右斗争，担任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筹备工作的几位重要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复办哲学系的事一时告吹。二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影响了派遣留苏生的部署。1957年，我到教育部高教一司请示时，有关人员说综合大学除理科不得继续派遣留苏生外，文科一般不再派出留苏生。这种情况，既排除了我留苏学习美学的需要，又堵塞了留苏学习美学的可能。组织上从工作需要出发，让我留在哲学教研室担任公共哲学课教师。我虽然表达过回中文系的愿望，但最终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出于工作责任心和荣誉感，我努力加强自学，竭尽所能地搞好教学。而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1960年秋，中山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办和招收本科学生，我也转为哲学系教师。在当时中苏分歧全面化和公开化的情况下，留苏学习美学当然全无可能。可喜的是1961年至1962年间，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我还去旁听、学习了有关美学的课程。从肖前、徐琳、庄福龄等老师的讲课中，获益良多。回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后，我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程。我希望把美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结合起来，作为日后学术发展的主攻方向，以

实现我心中长久的爱好及意愿。但是，很快发生了所谓“教育革命”，从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革除了美学课程。我想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了。紧随而来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这股狂潮不仅完全打乱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正常运转，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同时把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扭曲的虚假的东西充分暴露出来，并且推向极端。在这股狂潮中，一方面，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它裹挟而盲动；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增多和日益荒唐的言论、事件，我也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对照、分析，以求得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思想上深入、全面的总结和思考，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1978年至1980年间，我在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期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黄枏森、庄福龄、马绍孟、施德福、余其铨、金顺尧、余源培、孙伯镗、胡福明、余少波等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共同研讨，互相切磋，使我得以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深入地独立思考，逐步地从思想上消除了以往僵化的扭曲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科学的理解。了解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首要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着手。可以说，这是我在思想上自觉实行的转折。在这个从不自觉到自觉和由浅入深的探索过程中，我认为关键是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

## 一、清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与神圣化的曲解，恢复、发扬其科学的、批判的本质

我最初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在大学本科学历学习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时。该课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这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公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最好的阐述。稍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其名称就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采用苏联学者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教材，其内容、结构大体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只是把认识论从唯物主义部分中分割出来，与辩证法、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并列，成为“两大主义”和“四小块”的结构模式；至于精神实质，更和斯大林的书完全一致。到1956年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工作时，已经有了中国学者编写的有关教材，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基本上是苏联有关教材的翻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接触、使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都给我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条化、神圣化的共同印象。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与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就明确地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sup>①</sup>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当他们创立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指导地位时，他们更反复地强调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当做“现成的公式”<sup>②</sup>和“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③</sup>，而应当看做是“研究历史的指南”<sup>④</sup>、“行动的指南”<sup>⑤</sup>。恩格斯特别批评了当时侨居美国的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国人的教条主义错误。他指出：“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sup>①</sup>

但是，虽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的批评、阐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并不可能完全绝迹。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现象，同时更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既有悠久的历史因素的影响，更有深刻的现实条件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和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物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甚至使教条化恶性膨胀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来，在斯大林执掌苏联领导大权前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倾向又突出起来，并且进一步推向神圣化。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某些相关的活动来看。当然，斯大林在领导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上建立了历史的功绩，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在理论上武装干部等方面发挥了历史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应否定的。但是，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始作俑者的错误，也必须给予应有的批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与政治混同起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论说某个哲学观点后，往往直接地简单地引出一个政治结论，并把它公式化。例如，在论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说世界的不断运动、发展后，即引出结论：“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sup>①</sup> 这一政治公式把“向前看”与“向后看”绝对地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典型。与此相类似的公式，《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还提出了许多条。这样从哲学观点直接引出政治公式，就把哲学与政治简单化地等同起来。其实，早在1930年12月批判德波林时，斯大林就亲自肯定德波林在哲学上的错误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错误完全混为一谈。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的公式，实际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成教条，另一方面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推向盲目信仰。斯大林这样做的原因，不仅在于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甚低，又不能向水平高于他的人学习；更主要的在于他要维护对领导大权的控制，树立个人权威；用他报告中的话来说，则是要巩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但是这样做，既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又造成了政治上的许多错误。斯大林在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就是与这类两极绝对对立的政治公式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另一“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把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高领袖垄断的专利。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

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 这段文章在逻辑上前后矛盾，在内容上陷入绝对化的错误。这段文章的前半部分认为，列宁继恩格斯之后，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继列宁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后半部分则肯定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的。按照文章前半部分的说法，后面的“唯一”既不能成立也不应使用。按照文章后半部分的“唯一”的规定，前面的“列宁的其他学生”就应排除在外，显然，这才是《结束语》作者突出“唯一”的真意所在。按照作者的认识与思路，恩格斯是在马克思之后，列宁是在恩格斯之后，斯大林是在列宁之后，“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单线嫡传”的“理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重要“依据”。因为按照这个“理论”，各个时期党的最高领袖是“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者，所以应高于广大干部群众而被当做神圣崇拜，相应地被“唯一”者“推进了”的理论，就成为只能盲目地信仰、奉行的神圣教条。是否这样做，也就成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早在1924年6月，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理论家批判卢卡奇期间，就以未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作列宁主义解释为标准，判定卢卡奇为“修正主义”。从上述的事例看来，斯大林的两大“创造”表面上似乎是“实践的总结”，但实质上是错误实践的错误总结。不能不指出，斯大林的“创造”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被“向前推进了”。诸如，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人民的“大救星”或“慈父”，宣扬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永远的普遍真理”，鼓吹对他们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18页。

行”，等等。这种观点虽然有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但是表现的同宗教教徒对他们的神和教义的盲目信仰、狂热崇拜一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相反。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是这种观点和方法的最集中和最突出的表现。这种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现代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本质的肆意践踏和完全否定。要消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的曲解，就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精神和本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本质，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有过深入的阐述。在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就明确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sup>①</sup> 在创立之后的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他又深刻地阐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②</sup> 马克思的论述，为科学地理解、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本质，提供了原则性的说明。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根本内容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而且，这种批判首先是指向旧世界的，其中重点是指向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批判既指向旧世界的经济制度，又指向旧世界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主义哲学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任务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它帮助无产阶级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二者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首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用以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马克思说，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指向“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所谓“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既包括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又包括每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新的社会、新的思潮同样必须在批判中发展。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①</sup> 改革也是一种批判，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发展。同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但是，现代个人迷信式的教条主义阉割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它认为，不能对革命领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因为革命领袖“洞察一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达到真理的“顶峰”。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体现绝对真理的“天堂”，等等。把批判锋芒指向这些，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动。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恩格斯认为：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sup>②</sup>。至于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126页。